

NEWSLETTER

跨境争议解决 刊物

Cross-border Dispute Resolution

第 19 期 2024 年 3 月 27 日

JT&N 金诚同达

CONTENT

目录

2024 版《IBA 利冲指引》修订要点	01
李露	
瑕疵仲裁条款在新加坡法下的补正——以约定不存在的仲裁机构为例	03
曾胜	
从新加坡法院驳回印度 Reliance 公司的撤裁请求案件 看国际仲裁策略制定和时间节点的重要性	05
吕斯琮、朱恩熙	
内地与香港互相认可执行民商事判决安排——惩罚性赔偿制度初探	08
林慕娟、邢静予、王华	
跨境海事诉讼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以新加坡法院 The “Sea Justice”案为视角	16
史强、易旻	
美国产品责任诉讼的风险与应对	21
李岚、岑琳	
IBA 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的修订与启示（一）	24
刘丁敏、唐起玥	

ABSTRACT

摘要

1. 2024 版《IBA 利冲指引》修订要点

李露

2014 年,《利冲指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2024 年 2 月,IBA 发布了经第二次修订的《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利冲指引》”)。IBA 指出,根据 2022 年对仲裁从业人员的调查,2014 年版《利冲指引》仍然是有用且高效的工具,无需全面修订,因此,仅就以下领域进行了更新和调整:(i) 仲裁员披露;(ii) 第三方资助;(iii) 事项冲突;(iv) 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专业人员的组织模式;(v) 专家证人;(vi) 主权国家或其机构;(vii) 非律师仲裁员;(viii) 社交媒体。

2. 瑕疵仲裁条款在新加坡法下的补正——以约定不存在的仲裁机构为例

曾胜

瑕疵仲裁条款源于当事人对于争议解决条款的忽视,其往往导致当事各方对于仲裁管辖权的争议。新加坡作为仲裁友好国家,其司法态度倾向于补正瑕疵,以充分尊重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的仲裁合意。本文以约定了不存在的仲裁机构这一瑕疵为例,介绍新加坡法下的两起经典案例。但无论如何,考虑到个案的差异,并非每一此类瑕疵均可补正,当事人仍须尽量避免瑕疵仲裁条款的出现。

3. 从新加坡法院驳回印度 Reliance 公司的撤裁请求案件看国际仲裁策略制定和时间节点的重要性

吕斯琼、朱恩熙

在 Reliance Infrastructure Limited v. Shanghai Electric Group Co Ltd 一案中,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SICC”)驳回了 Reliance Infra 提出的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缺乏管辖权、裁决受到上海电气欺诈且违背了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为由的撤裁申请,原 SIAC 裁决生效。SIAC 裁决 Reliance Infra 公司需向上海电气支付约 1.46 亿美元。在本案中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若被申请人 Reliance Infra 未在仲裁程序中提出仲裁协议的签字伪造的抗辩,是否就视为放弃了对仲裁庭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权利?

4. 内地与香港互相认可执行民商事判决安排——惩罚性赔偿制度初探

林慕娟、邢静予、王华

2024 年 1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安排》”)在内地与香港同时生效,覆盖两地民商事领域 90% 以上生效判决,标志着两地在法律规则衔接上实现新突破。其中,《安排》第 16 条、第 17 条对惩罚性赔偿的认可与执行作出专门规定。本文结合《安排》的规定,对两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概念、原则、适用场景进行梳理与对比,并初步探析《安排》项下这一制度的适用。

ABSTRACT

摘要

5. 跨境海事诉讼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以新加坡法院 The “Sea Justice”案为视角

史强、易旸

在国际海事纠纷中，案件当事人通常可以在多数国家通过扣押船舶的方式使该国司法机关获得对案件实体纠纷的管辖权。这种方式确定的实体管辖地未必与案件争议的事实因素具有实际连接点，案件当事人会以“不方便法院（*forum non conveniens*）”理论对扣船地法院的管辖提出异议。本文结合近期公布的新加坡法院审理的“交响乐”轮与“义海”轮因我国海域碰撞案引起新加坡扣船及法院管辖权争议案件结果，比较分析中新法院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审查条件。

6. 美国产品责任诉讼的风险与应对

李岚、岑琳

美国市场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主要市场之一。在过去，中国企业主要通过美国当地零售商进行产品分销；近年来，许多中国企业也逐步通过各种互联网平台在美国销售。无论采取传统的线下分销还是新兴的跨境电商销售方式，中国企业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美国的产品责任索赔和诉讼风险。由于美国法律制度和社会本身的一些特点，这类产品责任索赔和诉讼的存在很大风险。中国企业不仅要积极应对，也要适当通过购买合适的产品责任险和合同条款的科学设计等方式对该等风险进行分散和转移。

7. IBA 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的修订与启示（一）

刘丁敏、唐起玥

国际律师协会（IBA）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利冲指引”）最近迎来自 2004 年发布后的第二次修订。新版利冲指引系在先前对广大国际商事与投资仲裁从业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的调查问卷之后完成的修订，内容上延续了 2014 版利冲指引的基本框架，回应了近年来包括第三方资助、不同法域法律执业组织形式、专家证人等在内的诸多引发业界热议的问题。本文旨在介绍 2024 版利冲指引的主要更新，并结合该等修订内容探讨新版利冲指引对我国内地商事仲裁实践及司法审查的启示意义。

2024 版《IBA 利冲指引》修订要点

李露

国际律师协会（IBA）于 2004 年发布了第一版《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利冲指引》”）。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逐渐被各国际仲裁机构推荐作为仲裁员披露和当事人申请仲裁员回避的首要参考。相较于仲裁规则中模糊的原则性规定，《利冲指引》以红色清单、黄色清单和绿色清单的形式，对仲裁员和当事人的不同关系形态进行了分类，简单明了的清单形式极富可操作性。

为适应仲裁实践发展，IBA 决定每十年评估一次其规则和指南是否应进行调整。2014 年，《利冲指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2024 年 2 月，IBA 发布了经第二次修订的《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利冲指引》”）。IBA 指出，根据 2022 年对仲裁从业人员的调查，2014 年版《利冲指引》仍然是有用且高效的工具，无需全面修订，因此，仅就以下领域进行了更新和调整：（i）仲裁员披露；（ii）第三方资助；（iii）事项冲突；（iv）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专业人员的组织模式；（v）专家证人；（vi）主权国家或其机构；（vii）非律师仲裁员；（viii）社交媒体。主要修订包括如下内容。

一、一般标准的修订


1. 律师事务所的架构和业务模式可能导致利冲

2014 年版《利冲指引》一般标准第 6 条（a）款指出，仅因为仲裁员所在律师事务所的活动与一方当事人有关联，不当然构成利益冲突或者必须披露的理由。该种情况应个案处理，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该律师事务所的具体活动，以及该仲裁员和律师事务所的关系。2024 年版《利冲指引》将“这些律师事务所和雇主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模式”也列为需考虑因素。

该条新增的评注提到，国际法律实践的结构演变引发了什么是一般标准第 6 条（a）款项下的“律师事务所”的问题。一般而言，这里的律师事务所指仲裁员是合伙人或者与仲裁员有正式关联的事务所，包括以雇员身份指令作为律师，或者对律师进行指令。不同律师事务所合作和/或分享利润的结构可以为认定仲裁员具有事务所的身份提供基础。同样的，在考虑利冲问题时，大律师事务所不应等同于律师事务所，但若大律师、当事人和/或律师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也可能属于披露范畴。

2. 扩大了具有“控制影响”的主体概念

2014 年版《利冲指引》一般标准第 6 条（b）款指出，任何法律实体或自然人，若对当事人一方有控制影响力，或与仲裁结果有直接经济利益，或有义务对仲裁结果进行赔偿，都可被视为具有该当事人的身份。2024 年版《利冲指引》新增了第 6 条（c）款，“一方当事人对其有控制影响力的任何法律实体或自然人都可被视为具有该当事人的身份”。



针对该款的评注解释认为，该条意味着，如果母公司是一方当事人，其子公司可以被视为具有母公司身份，如果母公司对其有控制影响力。如果当事人是自然人，自然人紧密控制且具有影响力的公司可能被视为具有自然人的身份。就国家来说，其组织结构中通常包括独立的法律实体，如地区或地方当局或自治机构，这些机构在法律和政治上可能独立于中央政府，不一定属于有“控制影响力”或者“直接经济利益”。

3. “律师事务所”扩大为“律师事务所”和“雇主”

之前《利冲指引》对于仲裁员所属机构，均称为“律师事务所”（包括大律师事务所）。2024 年版《利冲指引》中修改为仲裁员的“律师事务所”和/或“雇主”，顺应了法律服务机构不同业态的发展趋势。

二、清单的修订

1. 关联方的范围扩大

在不可弃权红色清单的脚注部分，2024 年版《利冲指引》扩大了“关联方”的范围，除同一公司集团内全部公司外，还包括对一方当事人有控制影响力，和/或一方当事人对其有控制影响力的个体。

2. 可能存在利冲的范围扩大

橙色清单表示可能存在利冲的情形，2024 年版《利冲指引》中橙色清单项目有所扩展，包括：（1）仲裁员在过去的三年中曾经在不相关的事宜中，被一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关联公司，两次或以上的指定协助模拟审判或者听证准备；（2）仲裁员在过去三年中曾三次以上被同一律师或同一律师事务所指定协助模拟审判或者听证准备；（3）仲裁员在过去三年中曾三次以上被同一律师或同一律师事务所指定为专家；（4）仲裁员目前或过去三年内，在一方当事人或其关联方在不相关事宜中担任专家；（5）一方当事人的仲裁员和律师目前在另一仲裁中担任仲裁员；（6）两名或以上的仲裁员目前在另一仲裁中担任仲裁员；（7）仲裁员目前在其担任律师的其他事项中指导出现在目前仲裁程序中的专家。

3. 公开宣传的载体扩大

除公开发表的论文及演讲外，2024 年版《利冲指引》还将社交媒体和“专业网络平台”列入仲裁员公开宣传的载体。这也是对仲裁实务趋势的积极响应。

4. 仲裁员和专家的正当接触

绿色清单中增加，若仲裁员在其他由其担任仲裁员的案件中，听取过在现有程序中出现的专家证言，无需披露。

瑕疵仲裁条款在新加坡法下的补正 ——以约定不存在的仲裁机构为例

曾胜

瑕疵仲裁条款是指欠缺了一个或多个要素，导致对于仲裁庭管辖权有不同理解的仲裁条款。瑕疵仲裁条款的反面是常见于各仲裁机构网站的示范条款。瑕疵仲裁条款产生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根源是当事人对于争议解决条款的忽视。当事人往往认为争议解决条款没有商务条款重要，因此潦草简单地对待争议解决条款的起草，致使了瑕疵的产生。

各国法院解决瑕疵仲裁条款的司法实践各不相同。以本文将探讨的约定了不存在的仲裁机构这一瑕疵为例，在中国法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精神，如果当事人之间约定了一家不存在的仲裁机构，中国法院将从当事人约定的原文出发，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去推定是否可以确定某一家仲裁机构，如果不能，则仲裁条款会被认定为无效。但对于该类瑕疵，新加坡法院的态度并不尽然相同。


在 HKL Group Co Ltd v. Rizq International Holdings Pvt Ltd 一案（“**HKL v Rizq 案**”）中（该案仲裁条款约定应当将争议提交并不存在的“新加坡仲裁委员会”，英文“the Arbitration Committee at Singapore”），新加坡法院认为：尽管名为“新加坡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机构并不存在，但该仲裁条款并非无效，而是可实行的——应交由双方当事人选择一家在新加坡的、可以适用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在该案中为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仲裁机构。

上述 HKL v Rizq 案近十年后，在 2022 年 Re Shanghai Xinan Screenwall Building & Decoration Co, Ltd（“**Shanghai Xinan 案**”）一案中，新加坡法院又作出了类似的判决。

在 Shanghai Xinan 案中，新加坡法院面对的是将“中国国际仲裁中心”（英文为“Chin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作为仲裁机构的瑕疵仲裁条款——在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法院认为，从仲裁条款的表述看，当事人合意仲裁，且选择了仲裁机构为“中国国际仲裁中心”，当事人不会故意选定一家并不存在的仲裁机构，很可能只是弄错了仲裁机构的名称而已。因此，法院指出，实质问题是仲裁协议是否可“体现仲裁机构就是 CIETAC”。

Shanghai Xinan 案法院进一步分析，该案仲裁协议所使用的表述（即实际不存在的“中国国际仲裁中心”）和中国境内知名仲裁机构 CIETAC（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名称非常相似，二者前两个词语（“中国国际”）是相同的，而且二者都含有“仲裁”一词。再结合该案其他证据和当事人的抗辩，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所约定的仲裁机构就是 CIETAC。

从上述 HKL v Rizq 案到 Shanghai Xinan 案，可以看到，新加坡法院处理此类瑕疵仲裁条款的态度一脉相承，即，仅是对仲裁机构的名称表述不准确，并不会必然导致仲裁条款的无效。只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合意确定无疑，新加坡法院会尊重该仲裁合意，在个案中根据案件



的具体情况确定仲裁机构：在 HKL v Rizq 案中是由当事人选择一家；在 Shanghai Xinan 案中是法院直接认定一家。

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在另一方依据瑕疵仲裁条款申请仲裁以后，可能考虑采取比较激进的策略，即不但不承认瑕疵仲裁条款的有效性，甚至拒绝参加仲裁程序。从上述两案可以得出结论，这种激进策略是非常不恰当的——新加坡法院倾向于补正瑕疵，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仲裁合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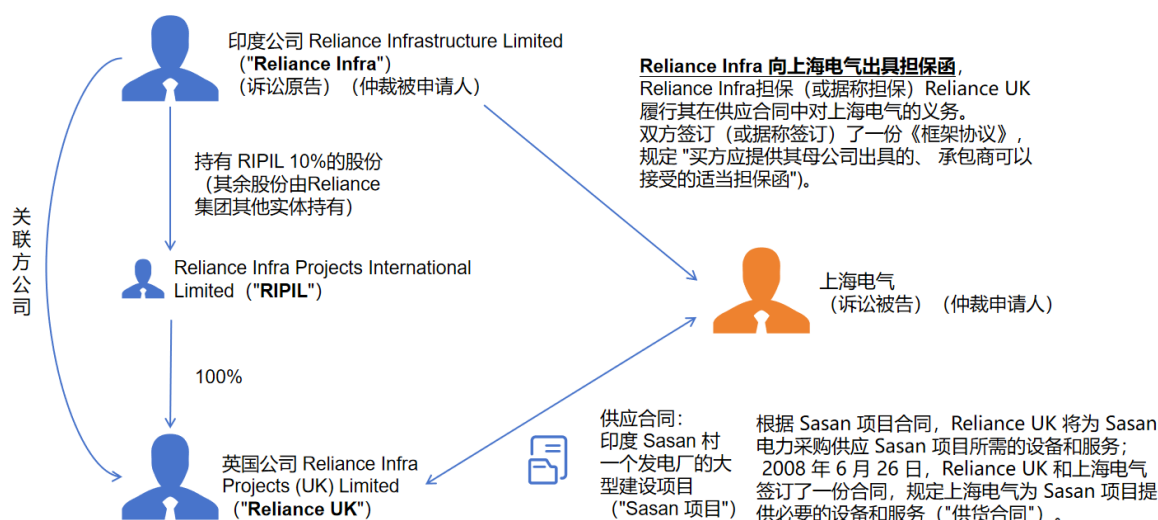
另外一方面，新加坡法院补正瑕疵仲裁条款的司法态度，也切忌成为当事人忽视仲裁条款的理由（即反正法院会帮助补正的态度不可有）。个案的具体情况不同，并非每一个瑕疵仲裁条款都能挽救，而因为瑕疵仲裁条款而导致的额外的时间成本、费用支出等，却是实打实的。仲裁条款等争议解决条款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任何一个商业条款。

最后，本文对于 HKL v Rizq 案和 Shanghai Xinan 案两案的探讨仅仅局限于新加坡法院的态度。实践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即便是新加坡法院补正了瑕疵仲裁条款，但是在其他司法辖区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过程中，由于《纽约公约》第五条赋予执行地法院可以因仲裁协议不存在而拒绝承认或执行的权力，执行地法院可能对于同样的瑕疵仲裁条款得出与新加坡法院迥然不同的结论。囿于篇幅本文不再对此问题进一步详细展开，但此种可能性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提醒当事人不可忽视争议解决条款，在起草时须尽量避免瑕疵仲裁条款的出现。

从新加坡法院驳回印度 Reliance 公司的撤裁请求案件 看国际仲裁策略制定和时间节点的重要性

吕斯琼、朱恩熙

一、案件概要



2008 年 6 月 24 日, 上海电气与 Reliance Infra Projects (UK) Limited ("Reliance UK") 签署了 Sasan 项目的供货合同, 规定上海电气为 Sasan 项目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服务。

2008 年 6 月 26 日, Reliance Infra 向上海电气出具由 Agrawal 先生签署的担保函, Reliance Infra 担保 (或据称担保) Reliance UK 履行其在供货合同中对上海电气的义务。而项目投入商业运营多年后, Reliance UK 仍拖欠上海电气设备款及其他相关费用未支付。

2019 年 12 月, 上海电气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了仲裁申请, 要求 Reliance Infra 根据其作为 Reliance UK (两家为关联公司) 出具的担保函中的约定向其支付至少 1.35 亿美元的相关款项以及其他费用。¹

2022 年 12 月,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裁决要求 Reliance Infra 向上海电气支付合计约 1.46 亿美元。²

2023 年 5 月, Reliance Infra 在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 ("SICC") 提起撤销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上述裁决的申请, 理由是关键性证据担保函的签字系伪造, SIAC 因此缺乏管辖权, 裁决涉及欺诈并违反公共政策。

2024 年 1 月 31 日, SICC 基于 "放弃异议" 判决驳回 Reliance Infra 提出的撤裁申请。

二、SICC 裁判理由³

在新仲的仲裁程序中，Reliance Infra 仅提出对担保函的效力的质疑，原因为公司内部无记录签发该担保函，以及代表公司在担保函上签字的 Agrawal 先生无授权。但 Reliance Infra 并没有指控担保函是伪造的，也未曾就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最终，SIAC 仲裁庭裁决，确认担保函效力并裁决 Reliance Infra 向上海电气支付相应款项。

Reliance Infra 随后向 SICC 申请撤裁的核心观点是担保函上的签名伪造，并基于此主张 SIAC 缺乏管辖权，裁决涉及欺诈并有违公共政策。在 SICC 的判决中，法院主要审查了管辖权相关的问题，并认为 Reliance Infra 是否放弃了以“担保函伪造”和“缺乏授权”为由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的权利是首要的争议焦点。

SICC 指出 Reliance Infra 未在仲裁中有过任何表示，仅在撤裁时第一次提出，并指出 Reliance Infra 既然知道以“担保函伪造”和“缺乏授权”为由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基本事实，而且没有充分的理由不提出该异议，那么现在就必须认为，由于它未在新仲程序中对管辖权提出这些异议，它便已经放弃了在 SICC 提出这些异议的权利。因此，Reliance Infra 的撤裁理由不成立。但 SICC 综合考虑该案在印度的诉讼情况，进一步对“担保函是否为伪造”以及“Agrawal 先生是否没有代表 Reliance 公司订立担保函的表见授权”进行了实质审查，并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SICC 进一步明确，即使 Reliance Infra 没有构成“放弃异议”，担保函依然有效，并支持了 SIAC 裁决结果。

三、评析

1. 本案中国际商事中的仲裁管辖权异议

在 SICC 审理过程中适用《国际仲裁法》（“IAA”），IAA 吸收了大部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示范法》”）的内容，并将《示范法》作为其附录一的内容。IAA 第 3 条明确规定除与第八章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相关的内容外，《示范法》在新加坡具有法律效力。


根据《示范法》第 16 条第（2）款的规定，有关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必须在提交答辩之前提出，除非能够证明存在正当理由延迟提出此类抗辩。

1) 时间限制

有关仲裁庭管辖权异议提出的时间点为，在提交答辩之前。该规定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各方当事人尽早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应该在仲裁程序的早期阶段提出管辖权异议，以避免被认为默认接受了仲裁庭的管辖权。

2) 正当延迟理由

如果一方当事人在早期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却在后期的程序中提出异议，需要证明有正当理由延迟提出异议。否则，仲裁庭/法院可能会认定其放弃了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而何种



情况可以被视为充分合理时，通常需要仲裁庭/法院行使评价的权力。

在本案中，Reliance Infra 在仲裁程序中有意选择了不提出“担保函伪造”的指控，理由是 Reliance Infra 非常确信其对于担保函有效性的其他指控将会使其在任何情况下赢得仲裁。然而，由于仲裁结果与 Reliance Infra 的预期不符，Reliance Infra 在法庭庭审阶段才重新提出“担保函伪造”和“缺乏授权”的指控。SICC 认为这不构成正当延迟的理由。

2. 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放弃异议条款

以上判决从实践的角度阐述了国际仲裁中的“放弃异议”（waiver of objection）原则。《示范法》第 4 条明确规定：“当事人知道存在任何本法中任何可以背离（parties may derogate）的条款或者仲裁协议没有被遵守的情况，但未在不过分迟延（without undue delay）或者指定的时间内提出该情况，应视为其放弃了异议。”

中国主流的涉外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也有类似的规定，如《2024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及《2024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均有放弃异议的规定：“一方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规则规定或者仲裁协议约定的任何条款或者情形未被遵守，但仍参加仲裁程序或者继续进行仲裁程序且不对此情况及时地、明确地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

3. 总结

鉴于 SICC 的判决，结合国际商事仲裁实践，当事方应在案件的早期阶段，就谨慎行事，进行全面调查，制定全盘诉讼策略，对程序性权利认真斟酌和考虑，以确定是否有必要或在何时提出相关异议，避免因对程序或策略的误判导致构成“放弃异议”，从而降低胜诉的可能性。

1 具体金额参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印度莎圣燃煤电站项目的重大仲裁进展公告》，2023 年 5 月 26 日。

2 具体金额参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印度莎圣燃煤电站项目的重大仲裁进展公告》，2023 年 5 月 26 日。

3 Reliance Infrastructure Ltd v. Shanghai Electric Group Co Ltd, [2024] SGHC(I) 3.

内地与香港互相认可执行民商事判决安排

——惩罚性赔偿制度初探*

林慕娟、邢静予、王华

一、引言

2024 年 1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安排》”)在内地与香港同时生效,覆盖两地民商事领域 90%以上生效判决,标志着两地在法律规则衔接上实现新突破。¹其中,《安排》第 16 条、第 17 条对惩罚性赔偿的认可与执行作出专门规定。本文结合《安排》的规定,对两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概念、原则、适用场景进行梳理与对比,并初步探析《安排》项下这一制度的适用。

二、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和地位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最早源自 1763 年英国 Wilkes v. Wood 一案,是相对于补偿性赔偿的一种特殊民事赔偿制度,通过让侵权人承担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以达到惩罚和遏制严重侵权行为的目的。


我国内地民事侵权赔偿理论一般坚持损害赔偿的补偿性原则,即赔偿的数额应当与实际损失相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规定了 11 种责任承担方式,并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作出一般性规定。²不难看出,内地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采法定主义,适用标准相对严格,不得随意扩大,其构成要件、适用场景和计算标准等均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与英国法律类似,在我国香港地区,惩罚性赔偿虽然同样是普通法的组成部分,但属于民事赔偿中的“异常情况”(anomaly),被严格限定于三类案件中才能适用。³通过考察两地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可知,内地和香港都将该制度作为一种填平救济的例外情形。

三、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原则

除了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性赔偿制度更主要的功能在于惩罚和威慑。这一制度突破了民事责任的衡平原则,承认补偿损失之外的超额赔偿,具有“准刑罚性”。⁴因此,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对适用惩罚性赔偿都采取相对审慎保守的态度。

在内地,惩罚性赔偿制度旨在提高侵权人的违法成本,引导社会公众的行为,预防同类型损害发生。实体法方面,惩罚性赔偿采法定主义;程序法方面,主张惩罚性赔偿所要求的证明



标准也更高。通常，原告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应当就：（1）加害人行为构成侵权；（2）具有侵权故意；（3）侵权情节严重；以及（4）受害人遭受实质危害承担举证责任。⁵

香港法院的观点与内地类似，认为惩罚性赔偿是一种惩罚（penalty）。具体而言，如果法院确信命令的数额的目的不是为了赔偿所遭受的损失，而是为了惩罚被告并阻止其他人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可以当然地视为一种惩罚。⁶此外，在 *William Allan v Messrs Ng & Co. (A Firm) And Another* 一案中，法院还认为，惩罚性赔偿是最后救济手段，作出相关裁决受适度和克制原则的制约（moderation and restraint）。对于当事人而言，请求惩罚性赔偿必须明确提出；在没有损失或者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损失的情况下，法院对这一主张将不予支持。⁷

综上，两地都将惩罚性赔偿视为补偿性赔偿外的特例，强调惩罚与威慑作用。在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时，两地法律（法院）态度都相对谨慎，通过实体上限定适用场景、程序上科以更高证明标准防止当事人滥用。

四、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场景

（一）内地惩罚性赔偿适用场景

内地于 1993 年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首次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并逐步扩大至知识产权侵权、产品责任和环境侵权三类案件中。由于惩罚性赔偿的制裁性，法律对其适用设定了加重要件，要求侵权人：（1）主观上故意或明知；（2）客观上“情节严重”（限于侵害知识产权）或“造成严重后果”。

《民法典》第 179 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一般规则，第 1185、1207 条以及第 1232 条还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场合规则。不过，这些规定相对抽象，还需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著作权法》等单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具体构成要件、认定标准、赔偿金数额的计算基数等。笔者梳理上述规定，对内地现阶段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审判思路总结如下表：

适用情形	法律依据	判断是否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
知识产权	民法典 1185 条 ⁸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认定故意：综合考虑被侵害知识产权客体类型、权利状态和相关产品知名度、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⁹ ● 认定情节严重：综合考虑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等因素。¹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计算基数：分别依照相关法律，以原告实际损失数额、被告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计算基数。若前述数额难以计算，则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并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¹¹ ● 倍数：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因同一侵权行为已被处以行政处罚款或刑事罚金的，不支持减免惩罚性赔偿责任，但在确定倍数时予以考量。¹²
产品责任	民法典 1207 条 ¹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认定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类。综合考虑生产者、销售者是否有侵害被侵权人的利益的意图，或者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但是无视受害人的的人身或者财产利益仍然生产、销售或拒绝补救等。受害人能够证明生产者、销售者存在间接故意即可。包括生产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假药、劣药、医疗器械等。 ● 认定严重后果：以发生实际损害为必要，且应当是造成严重损害的事实，即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综合考虑主观恶性、不法行为持续时间、是否明知产品缺陷造成实际损害仍然生产销售，采取措施隐瞒缺陷等因素。 ● 考量原告的情况、原告所受损害的程度、受缺陷产品影响的原告数量等。原告死亡、重伤、残疾的，使众多受害人遭受损失的，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应增多。 ● 如果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了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则应减少惩罚性赔偿的金额，避免对生产者、销售者进行双重惩罚。

生态侵权	民法典 1232 条 ¹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认定故意：根据侵权人的职业经历、专业背景或者经营范围，因同一或者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情况，以及污染物的种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方式等因素综合判断。¹⁵ ● 认定严重后果：根据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判断。¹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计算基数：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金、财产损失数额作为计算基数。¹⁷以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数额作为计算基数。¹⁸ ● 倍数：综合考虑侵权人的恶意程度、侵权后果的严重程度、侵权人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或者侵权人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及其效果等因素，一般不超过人身损害赔偿金、财产损失数额的二倍。已被处以罚款或罚金的，不予免除惩罚性赔偿责任，但在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时可予以考虑。¹⁹
------	--------------------------	---	---


（二）香港地区惩罚性赔偿适用场景

如前所述，Rookes v. Barnard 一案确立了香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三类场景，分别为：（1）由政府公务人员实施的压迫性、恣意的或违宪的行为；（2）被告行为使其获得的利益远超出应给原告支付的任何损害赔偿；（3）成文法明确许可的情形。²⁰

上述第一类场景下的行为主体不单只包括政府公务人员，还包括所有行使政府职能的机构或个人。第二类场景主要针对获利的侵权行为，只要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预期收益（无论是否实际获得）超出其支付的损害赔偿金额，法院即有可能判令施以惩罚性赔偿。²¹ 案件类型包括诽谤（libel）、非法侵入（trespass）等各类案件。第三类场景主要取决于是否有成文法明确授权（authorised）。

对于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观构成要件，香港法院的态度与内地规定类似，只针对故意不当行为（deliberate wrongdoing），过失案件的当事人不能请求惩罚性赔偿。

对于惩罚性赔偿的具体适用及数额确定，香港法官拥有相对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不过，法官在适用惩罚性赔偿通常比较谨慎，将综合考虑补充性赔偿是否不充分、受害人是否存在挑衅行为或不配合行为、是否已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等因素。对于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根据 Riches v. News Group Newspapers Ltd 一案确立的规则，当有多个原告时，一般情况下法院将裁



定一笔总的赔偿金额并在原告之间平均分配。²²

（三）总结与分析

内地和香港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都要求侵权人具有主观恶意；法院通常也会将侵权情节、是否已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等作为考量因素。不过，虽然两地法律（法院）都坚持审慎态度，但在情形上存在一定差异。内地法律明确将适用情形严格限制于三类案件中；而香港则受到英美判例法的影响，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场景更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相应更大。

四、《安排》中的惩罚性赔偿与评析

（一）《安排》中的惩罚性赔偿

根据《安排》第 16 条及第 17 条规定可知，原则上，根据上述规定，惩罚性赔偿不会被两地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²³但对知识产权侵权和商业秘密侵权作出例外规定，允许这两类案件中惩罚性赔偿的互认。需要注意的是，该些案件中互认“限于根据原审法院地发生的侵权行为所确定的金钱判项”，即如果法院对于法院地以外发生的侵权行为作出认定并判决金钱责任，则不予认可和执行。²⁴

（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是否属于惩罚性赔偿

《民事诉讼法》第 264 条规定在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表面上看似具有“惩罚性赔偿金”的性质。

而在内地，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再 25 号案中认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并不构成“惩罚性赔偿”，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仅为普通债权，其虽具备一定的惩罚性，但仍属利息的范畴。《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所列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亦将其排除在外。

不过，针对内地“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判决能否作为“惩罚性赔偿”而获得认可和执行，域外司法管辖区存在不同做法：

（1）英国法院在 *Hangzhou Jiudang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td v Kei Kin Hung* 一案中予以了支持。该法院指出，该赔偿是支付给债务人，而非支付给主权国家；同时，按照英国最新的罚金条款规定，若该条款的目的在于合法地威慑（*legitimate policy of deterrence*），则具有正当性。内地法律关于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规定正是意在合法威慑，且相关判决中的利率并非畸高，因此并不违反英国的公共政策，因此法院应避免在这一问题上过度反应而作出否定性判决。²⁵

(2) 与之相反，香港法院在 *Hung Fung Enterprises Holdings Ltd v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一案中，法院认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是一种“惩罚”（penalty），因此出于“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原因不予认可和执行相关判决。法院认为，这笔款项是支付给个人还是国家并非判断是否构成惩罚性赔偿的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这笔赔偿的目的是否在于惩罚被告及警告其他人不能有同样的行为。内地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具备这一特点，因此不能被执行。

26

综上，结合目前香港的判例及内地的法律规定、司法案例来看，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在大陆并未被归类于惩罚性赔偿，但是在香港被认定为“惩罚性赔偿”，在香港难以获得认可和执行。

五、展望

作为一种特殊的损害赔偿，内地和香港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都采取了相对谨慎保守的立场。在《安排》的框架下，对知识产权侵权和商业秘密侵权两类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认可和执行；然而，两地可能对于某些特殊的支付判定是否属于惩罚性赔偿存在不一致的认定，可能导致对某些特定的支付判定的认可和执行的不同认定结果。

* 本文对任何提及“香港”的表述应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情况报告（2019-2022）》。此外，两地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已根据香港相关规定转化为本地立法，即《内地民商事判决（相互强制执行）条例》与《内地民商事判决（相互强制执行）规则》，为便于理解，笔者在正文部分统一以《安排》的文本进行解读。

2 《民法典》第 179 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金；（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3 *Rookes v Barard* [1964] AC 1129.

4 参见吕英杰：《惩罚性赔偿与刑事责任的竞合、冲突与解决》，载《中外法学》2022 年第 5 期。

5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裁判指引》，2022 年 4 月 21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6 *Hung Fung Enterprises Holdings Ltd v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2012] 3 HKLRD 679, [2012] HKCU 1275 (CA).

7 *William Allan v Messrs Ng & Co (a firm) & Anor* [2012] 2 HKC 266, [2012] 2 HKLRD 160 (CA).

8 《民法典》第 1185 条：“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 3 条：“对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被侵害知识产权客体类型、权利状态和相关产品知名度、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对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

- 故意：（一）被告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通知、警告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二）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的；（三）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代理、代表等关系，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四）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五）被告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六）其他可以认定为故意的情形。”
-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4条：“对于侵害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等因素。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一）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二）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三）伪造、毁坏或者隐匿侵权证据；（四）拒不履行保全裁定；（五）侵权获利或者权利人受损巨大；（六）侵权行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人身健康；（七）其他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
- 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5条：“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当分别依照相关法律，以原告实际损失数额、被告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计算基数。该基数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前款所称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计算的，人民法院依法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并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
-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6条：“人民法院依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处以行政处罚款或者刑事罚金且执行完毕，被告主张减免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确定前款所称倍数时可以综合考虑。”
- 13 《民法典》第1207条：“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或者没有依据前条规定采取有效补救措施，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 14 《民法典》第1232条：“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6条：“人民法院认定侵权人是否具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故意，应当根据侵权人的职业经历、专业背景或者经营范围，因同一或者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情况，以及污染物的种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方式等因素综合判断。”
- 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8条：“人民法院认定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应当根据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判断。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他人死亡、健康严重损害，重大财产损失，生态环境严重损害或者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
- 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9条：“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应当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金、财产损失数额作为计算基数。前款所称人身损害赔偿金、财产损失数额，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予以确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 1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12条：“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作为被侵权人代表，请求判令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前述规定予以处理。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以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数额作为计算基数。”
- 1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10条：“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应当综合考虑侵权人的恶意程度、侵权后果的严重程度、侵权人因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或者侵权人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及其效果等因素，但一般不超过人身损害赔偿金、财产损失数额的二倍。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已经被行政机关给予罚款或者被人民法院处罚金，侵权人主张免除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时可以综合考虑。”

20 见 *Rookes v Barnard* (No.1), 1964 WL 19640 (1964)“...Exemplary damages can be awarded in cases (i) of oppressive, arbitrary or unconstitutional acts by government servants; (ii) where the defendant's conduct had been calculated by him to make a profit for himself which might well exceed the compensation payable to the plaintiff; (iii) where expressly authorised by statute....”

21 见 *Cassell & Co Ltd v Broome* [1972] AC 1027 at 1130, [1972] 1 All ER 801 (HL) at 873–874.

22 见 *Riches v News Group Newspapers Ltd* [1986] QB 256, [1985] 2 All ER 845 (CA, Eng).

23 另经笔者检索，《安排》生效前，内地并无认可和执行香港惩罚性赔偿的案例。

24 参见姜启波、周加海、司艳丽等：《〈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9年第7期。

25 *Hangzhou Jiudang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td v Kei Kin Hung* [2022] EWHC 3265 (Comm).

26 *Hung Fung Enterprises Holdings Ltd v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2012] 3 HKLRD 679, [2012] HKCU 1275 (CA).

跨境海事诉讼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以新加坡法院 The “Sea Justice”案为视角

史强、易旻

在国际海事纠纷中，案件当事人通常可以在多数国家通过扣押船舶的方式使该国司法机关获得对案件实体纠纷的管辖权¹。这种方式确定的实体管辖地未必与案件争议的事实因素具有实际连接点，案件当事人会以“不方便法院（*forum non conveniens*）”理论对扣船地法院的管辖提出异议。本文结合近期公布的新加坡法院审理的“交响乐”轮与“义海”轮因我国海域碰撞案引起新加坡扣船及法院管辖权争议案件结果，比较分析中新法院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审查条件。

一、新加坡法院对“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判断标准

新加坡法院公布了 The “Sea Justice”案的判决²，其核心争议之一是对新加坡法院是否应对实体纠纷行使管辖权。该案纠纷源自 2021 年 4 月在我国青岛海域发生的“A Symphony”轮（“交响乐”轮）和“Sea Justice”轮（“义海”轮）碰撞事故。该事故造成“交响乐”轮船体破裂，引发其载运的沥青混合物³泄露导致海洋油污污染。事故发生后，两船所有人及保险人在青岛海事法院启动了一系列司法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 CLC 公约下的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彼此提起关于碰撞责任的民事诉讼等。

在 2021 年 4 月，“交响乐”轮所有人（即原告）针对“义海”轮在新加坡提起了对物诉讼⁴，并于 2022 年 10 月在新加坡扣押了“义海”轮。“义海”轮船舶所有人遂提出的多项申请，其中包括要求基于“不方便法院”原则终止新加坡程序而将争议交由中国法院的司法程序解决。

新加坡法院对“不方便法院”问题的审查采用了英国法院使用的“斯皮利亚达规则”（*Spiliada test*），并据此将审查过程划分为两阶段分析：

（一）第一阶段：青岛海事法院是否是“显然或明显更适合（*clearly or distinctly more appropriate*）”案件审理的法院

在第一阶段的问题审理中，法院归纳了若干个焦点问题。其中从海事诉讼角度值得关注的焦点是，因碰撞事故准据法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即中国法），所以，新加坡法院是否会采用与中国法院相同的方式适用和解释中国法。

新加坡法院从两国参加的海事公约（主要是《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简称“COLREGS”）及两国所属的不同法系的角度分析对此问题进行的分析：

第一，两国是 COLREGS 缔约国不意味着两国法院会对损失认定采用相同观点。原告以两

国均是 COLREGS 缔约国为由认为新加坡法院可以适用中国法审理碰撞案件。但是，新加坡法院认为，无证据表明中国法院会对该公约采用与新加坡法院相同的解释和适用方式，且该案中没有相关证据涉及到中国法院是否采用与新加坡法院相同的方式核算碰撞损失。⁵

第二，新加坡法院还指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不同。新加坡是《经 1996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6 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1976 LLMC”）的缔约国。中国未加入该公约，而是在《海商法》里规定了本国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比较而言，新加坡法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要高于中国国内法的规定。⁶

第三，没有证据证明中新两国法院对碰撞责任划分、损失核定等方面会采用相同的方式。新加坡法院指出，原告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中新两国属于不同法系的国家，而在此情况下，原告方负有举证责任证明两国法院会对责任划分、损失核定采用相同或基本相似的方式进行。⁷

新加坡法院最终认为，原告方没有证明新加坡法院可以没有任何问题（have no issue）地适用中国法审理本案，并认为中国法院才是能更好地适用中国法审理碰撞案件的法院。

同时，法院还在本案中从证据提交和证人出庭的便捷性、避免不一致判决、减少不必要抗辩成本等方面对青岛海事法院较之新加坡法院是更为“适合（appropriate）”审理本案的法院进行了论述。


（二）第二阶段：暂停新加坡程序是否会构成对原告（“交响乐”轮）的不公正或损害其“司法利益（judicial advantage）”

对第二层问题审查的焦点集中于中国法律规定低于新加坡法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是否导致原告在中国诉讼带来不“公正”或“司法利益（judicial advantage）”受损。“交响乐”轮方主张，如新加坡诉讼程序被终止，则其将会失去已在新加坡司法程序下获得的“担保”。

新加坡法院指出，该方主张的核心是其意图基于新加坡法规定的更高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从而获得更高的索赔利益⁸。法院认为，此类利益并不是“斯皮利亚达规则”中第二阶段审查应考虑司法优势（judicial advantage）⁹，并认为如允许“交响乐”轮方的主张，这将导致“义海”轮方面不得不在新加坡再设立责任限制基金¹⁰。新加坡法院认为，索赔方无权要求被索赔的船东选择设立限制基金的地点，而法院也不应协助索赔方去寻求更高限额的保护¹¹。

二、我国法律下的“不方便法院”判断标准发展

在 2023 年 9 月 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颁布前，我国并仅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引和司法解释等方式对此问题加以规定。其中，最重要的规定见于 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4 年民诉法解释》”）第 532 条。该条文规定了法院“可以”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驳回起诉的六个条件，而后续最高人民法院对《民诉法解释》的修订也均保留了该条款及其中措辞¹²。上述条件中最具特色的条款即是其中第（四）项“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有学者称其为“中国利益条款”¹³，故下文采用此简称）。我国海事法院也经常涉外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住所



地¹⁴、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住所地¹⁵位于我国内地而直接驳回基于“不方便法院”原则提起的管辖权异议申请。

但在 2023 年 9 月 1 日颁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订后，2024 年 1 月 1 日生效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 282 条¹⁶，对法院受理涉外案件时运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情形做出了规定。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即删除了上述“中国利益条款”，也不再将“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条件之一。

三、中新法律下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差异


比较《民事诉讼法》第 282 条对“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条件与上述新加坡法院的审查标准，两国仍存在明显差异，笔者认为主要可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审查标准的逻辑基础不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82 条仍采用列明的必要条件，即只要法院根据事实判定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即可以直接驳回申请人的管辖权异议。新加坡法院采用的审查标准则要求法官基于对若干因素的逐阶段查明和比较：首先，判断是否存在外国法院较之本国法院更“适合”审理（而非仅是“方便”）。如在本案中，新加坡法院判决书中详细分析了中新两国法律制度差异导致法院适用中国法审理案件是否存在困难，并分析了证据和证人的便利性等诸多因素；其次，法院需进一步判断案件交于该外国法院审理是否带来对当事人的“不公正”结果。

另一方面，两国审查时对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规定不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82 条没有规定在当事人之间对所列若干情形证明责任的分配，但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件中认为应由被告方（即主张管辖权异议的一方）承担证明案件满足全部列明条件的举证责任¹⁷。新加坡法院所适用的“斯皮利亚达规则”则明确两层审查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不同的：第一层问题由主张存在“更方便法院”的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而第二层问题则由原告方承担举证责任。

由于“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混合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尤其是如新加坡等普通法系国家的法院审查标准更为复杂和多样，涉及更复杂的举证策略。在 *The “Sea Justice”* 案中，新加坡法院就多次指出有关当事人对中新两国法院适用法律问题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所以，当事人不仅要对其他“适合”审理案件法院的主张提供事实证据，还往往需要提供外国法专家意见对有关法律的适用问题做以专门阐述和论证。

-
- 1 《1952 年统一海船扣押某些规定的国际公约》第 7 条和《1999 年国际扣船公约》第 7 条均确立了扣船地法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享有对实体纠纷的司法管辖权。我国虽未加入上述公约，但《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19 条规定“采取海事请求保全的海事法院”对实体纠纷享有管辖权。
- 2 [2023] SGHCR 24; [2024] SGHC 37，其中有关“不方便法院”问题的论述主要在该案一审（[2023] SGHCR 24）的判词中，本文有关新加坡法院观点的内容也主要援引自该案一审判决。
- 3 属于《1969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1992 年议定书》（“CLC 公约”）定义的“持久性油类”
- 4 HC/ADM 61/2021
- 5 ¶48, [2023] SGHCR 24.
- 6 ¶¶49-50, [2023] SGHCR 24.
- 7 ¶51, [2023] SGHCR 24.
- 8 ¶109, [2023] SGHCR 24.
- 9 ¶110, [2023] SGHCR 24.
- 10 ¶111, [2023] SGHCR 24.
- 11 ¶117, [2023] SGHCR 24.
-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 年修正）第 530 条：涉外民事案件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一）被告提出案件应由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协议；（三）案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四）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五）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六）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
- 13 裴洋、张倩：论中国不方便法院原则中的“中国利益”条款，载《国际法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21-140 页。
- 14 （2014）广海法初字第 451-1 号；（2014）广海法初字第 487-3 号，在上述两案中，广州海事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为我国法人依法成立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且涉案货物的运输始发地在我国境内，不符合‘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条件，被告三井会社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
- 15 （2020）闽 72 民初 239 号，厦门海事法院认为：“本案施瑞朝、谢灿堂和陈富祥系我国内地居民，案件涉及内地利益，故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情形。”（2017）沪 72 民初 2384 号，上海海事法院认为：“本院认为，本案是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履行而引发的争议，上海作为提单签发地、货物起运地，较香港而言，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更为直接和紧密。原告虽是注册在香港的企业，但其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为中国内地居民，也愿意在中国内地法院进行诉讼，不存在本院不方便管辖的情由，故两被告的此项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 16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外民事案件，被告提出管辖异议，且同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告知原告向更为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一）案件争议的基本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当事人参加诉讼均明显不方便；（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人民法院管辖的协议；（三）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四）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五）外国法院审理案件更为方便。
- 裁定驳回起诉后，外国法院对纠纷拒绝行使管辖权，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审理案件，或者未在合理期限内审结，当事人又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17（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 392 号“西斯威尔国际有限公司、西斯威尔香港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 157 号“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专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美国产品责任诉讼的风险与应对

李岚、岑琳

一、常见场景

在美国，制造商或销售商面临产品责任索赔与诉讼非常常见。制造商企业在美国自行销售产品后面临产品责任索赔与诉讼，或将产品销售给美国经销商，由经销商在美国售给终端用户，当面临产品责任索赔时，根据制造商企业与经销商合同中的赔偿（indemnification）条款，制造商企业会被要求承担这类案件中的所有风险，包括应对诉讼和支付赔偿，使美国经销商不受损失（hold harmless）。中国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在美国进行销售也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出口方式，以亚马逊平台销售为例，中国企业卖家通过亚马逊平台销售产品，当产品责任案件发生时，卖家往往会收到来自亚马逊要求代为抗辩并承担责任（tender of defense）的信函，根据亚马逊与卖家之间的协议（Amazon Services Business Solutions Agreement），亚马逊卖家被要求聘请律师为亚马逊抗辩并承担该案给亚马逊造成的责任和损失，与此同时，亚马逊平台一般会将卖家在亚马逊账户上的资金冻结。

在美国产品责任案件中，被告面临被判赔高额赔偿金或者最终高额和解的情况并不罕见，比如烟草公司 Philip Morris 在一起案件中被判赔给原告 280 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以及 85 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Dow Corning 因其硅胶植入物产品破裂被诉最终以 20 亿美元和解，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Chrysler）公司因其产品导致四岁男孩在一起车祸中丧生被判赔偿 1.5 亿美元；即便是购买金额不高于一百美元的小型家用电器、充电宝、功能性服饰等，案件最终解决金额一般也在几万到几百万美元不等。

二、美国产品责任诉讼的风险点

中国企业在美国遭遇产品责任索赔和诉讼，面临的风险往往远大于在国内的产品责任索赔和诉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美国产品责任索赔的损失类别多

面临终端用户的个案索赔时，在美国法律下可被支持的索赔类别较多，包括各类非经济损失，比如痛苦与折磨、亲权损失、丧失抚养、精神损失、惩罚性赔偿、预期收入、医疗费、财产修复损失等。

此外，如果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某型号产品在美国被停止销售，也会引发下游经销商或零售商向提起制造商的索赔，常见的索赔损失类型有停售退回库存以及换货或退款费用、专业机构服务费和各类补救措施费用、利润损失甚至商誉损失。

2. 损失认定门槛较低，实际成本较高

美国法律对于损失的认定门槛较低，美国法院支持原告主张损失的可能性较高；由于美国



社会自身特点，实际花费高，这些都导致在美国产品责任案件中往往赔偿金额很高。比如，美国法院容易判决高额精神损害赔偿；在制造商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法院可能给予惩罚性赔偿；预期收入损失采用被害人的实际收入水平而非当地平均工资等较低工资标准；由于美国的医疗费和人工成本高昂，医疗费和财产修复损失也会判赔较高，而有些患者还需要持续治疗，则这些后续治疗的医疗费也可能在赔偿范围内。

3.集体诉讼索赔风险

被告也有可能面临来自终端用户的集体诉讼索赔。在集体诉讼案中，一个消费者可不经其它消费者明确授权，代表其他全部类似地位的消费者向制造商提起诉讼。而法院是否同意认定（Certification）为集体诉讼是这类案件的关键。集体诉讼索赔比之个案索赔，风险远远更大，因为一旦认定为集体诉讼则索赔费很有可能膨胀到千万美元级别。

比如，在 2023 年 9 月，飞利浦 Respironics 同意支付至少 4.79 亿美元作为“赔偿基金”以和解其呼吸机设备产品召回相关的集体诉讼。每个召回设备的赔偿金额在 55.63 美元至 1552.25 美元之间，且每位退还一台设备还将额外获得 100 美元的赔偿。而该 4.79 亿美元和解并不解决人身伤害或医疗监控方面的索赔，仅适用于已购买、租赁或租用的被召回设备，且随着更多被召回的设备被退回，赔偿基金的数字还会增加。飞利浦表示其在 2023 年第一季度已计提约 6.15 亿美元用于支付预计的成本。目前，该和解方案还有待法院批准。

4.政府禁售令、罚款及引发召回


如果产品出现不合规或者存在安全隐患，在美国还可能会面临政府禁售令、罚款以及引发召回。联邦各部门对于其分管领域的产品不合规问题设置金额不同的高额罚款，比如根据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部门 CPSC 相关法规，制造商一旦得知相关产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应通知 CPSC，否则 CPSC 有权处以 1500 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如果产品被禁售，则将遭受库存损失和利润损失。召回也会引起下游经销商的索赔与召回相关的费用支出。

此外，此类处罚和召回通知一旦公布，经销商和制造商就会面临更多的产品责任索赔与诉讼。

5.美国法律制度本身的特点

由于美国法律制度本身特点，产品责任诉讼中原告更容易获得索赔且赔偿金额较高，比如，在美国，产品缺陷认定标准一般为合理替代设计标准——如果产品存在合理可被替代的设计方案，而制造商没有使用，则产品会被认定为存在缺陷；缺陷的证明方式一般为原被告提供专家意见进行举证；陪审团采取的证据认定标准为一般优势证据标准，则原告证据更容易被采信。总体而言，美国产品责任法律对于制造商要求较为苛刻，制造商承担的责任重，且抗辩较难，制造商常常会提出产品符合安规、产品责任事故属于用户误操作或产品已超过使用寿命等等免责事由以进行抗辩，但这些抗辩在美国产品责任诉讼中不易成立。

此外，就程序而言，美国产品责任诉讼的法律程序也更加冗长和繁杂，包括书面质询、取证、检查或专家现场勘验、承认请求、证据开示等，结合美国律师通常采取的小时费率收费方式，往往会产生高昂的法律费用。针对一些小额索赔的个案来说，法律费用甚至可以高于判决



/和解费用。

三、风险防范与应对思路

1. 尽早介入，积极应对

制造商尽早与经销商进行沟通，获取案件的一手信息，提供对案件解决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商务合作进行协调，尽量控制案件的费用与成本。

在互联网平台销售的情景下，以亚马逊平台为例，亚马逊卖家可尽早与亚马逊取得沟通，促成账户金额的解冻，与亚马逊进行协调，主动把握案件走向和控制费用成本，避免因消极应对而导致亚马逊自行应对后产生巨额律师费进而向其索赔，或者错过可能较佳的与原告化解纠纷的机会。

2. 通过产品责任保险和召回保险转移部分风险

由于美国产品责任风险巨大，建议产品出口至美国的制造商尽量购买产品责任保险并根据产品类型等因素考虑是否购买产品召回险。然而，市场上不同保险公司的不同产品责任险带来的保障程度也有显著差别，企业在购买保险时应妥善选择保险公司，认真审阅保单中理赔条件、免赔额、被保险人范围、免赔条款、承保的产品范围等内容，选购能最大程度实现自身风险减免的保险。

在事故发生后，及时报损，在自身、保险公司与销售商/互联网销售平台（如亚马逊）之间进行良性协调，控制和管理赔偿额度，让保险发挥最大的风险转移作用。

3. 通过采购合同将风险转移给供应商

许多面临产品责任诉讼风险的中国企业一般是整机制造商，产品的许多零配件从其他供应商采购而来，甚至产品研发也外包给其它设计公司进行。此时，整机制造商应考虑如何将其从美国零售商或互联网销售平台承接的风险通过采购合同或产品研发合同的条款设计向零配件供应商和设计供应商进行转移。这种操作涉及多国法律和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建议咨询专业律师协助。

IBA 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的修订与启示（一）

刘丁敏、唐起玥

国际律师协会（IBA）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利冲指引**”）最近迎来自 2004 年发布后的第二次修订。新版利冲指引系在先前对广大国际商事与投资仲裁从业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的调查问卷之后完成的修订，内容上延续了 2014 版利冲指引的基本框架，回应了近年来包括第三方资助、不同法域法律执业组织形式、专家证人等在内的诸多引发业界热议的问题。

本文旨在介绍 2024 版利冲指引的主要更新，并结合该等修订内容探讨新版利冲指引对我国内地商事仲裁实践及司法审查的启示意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分为两部分呈现，本期分享第一部分。

一、新版利冲指引中值得关注的更新

整体上看，除了明确部分措辞的含义外，新版利冲指引进一步规范了仲裁员的回避义务和当事人的合理调查义务，明确了仲裁员未披露不必然意味着应当回避或存在利益冲突，还扩大了利益冲突主体的考察范围，增加了多项仲裁员的披露义务（见“橙色清单”内容）。具体而言，

1. 第一部分“公正、独立和披露的一般标准”的修订

A. 仲裁员披露

2024 版利冲指引在一般标准 3 “仲裁员披露”部分新增了特定情形下仲裁员不得接受任命的义务（第（3）条第（e）款）和仲裁员未能披露时对案件效力的影响（第（3）条第（g）款）等内容。

第（3）条第（e）款规定：“若仲裁员发现应当进行披露，但职业保密规则或其他执业规则或职业行为准则阻止其进行披露，则仲裁员不应接受指定或应辞职。”¹

第（3）条第（g）款规定：“仲裁员未披露可能在各方当事人看来可能对仲裁员的公正性或独立性产生疑问的事实和情形，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利益冲突，或应当回避。”²

B. 当事人弃权

根据 2014 版利冲指引一般标准 4 “当事人弃权”部分第（4）条第（a）款规定，若当事人在收到仲裁员披露的信息或者知悉可能构成仲裁员潜在利益冲突的事实或情形后 30 日内未提出明示异议，则视为其已放弃基于此类事实或情形主张仲裁员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权利，其亦不得在以后阶段基于此类事实或情况提出任何异议。³

2024 版利冲指引在第（4）条第（a）款则进一步明确了当事人对仲裁员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合理调查义务（第（4）条第（a）款的第3段），即“若在仲裁前或者仲裁中通过合理调查即可了解到前述可能构成仲裁员潜在利益冲突的事实或情形，则视为当事人已经知悉该等事实与情形。”⁴

C. 关系

为反映法律执业组织形式的演变，2024 版利冲指引扩展了对律师事务所（law firm）形式及其与仲裁员关系的考量。新版利冲指引在一般标准 6 “关系”（第（6）条（a）款）中规定了何时应当考虑将仲裁员与其律师事务所或雇主视为同一身份，即“仲裁员原则上视为与其律所或雇主是同一身份的，但当考察事实或情形的相关性，以判明是否存在潜在利益冲突或是否应进行披露时，应在个案中考虑仲裁员的律师事务所或雇主的活动（如有）、该律师事务所或雇主的组织结构和执业模式，以及仲裁员与律师事务所或雇主的关系。...”⁵

为更精准地把握利益冲突主体范围，新版利冲指引还进一步规定了何时应当考虑将其他法人或个人视作一方当事人。根据第（6）条第（b）款，“任何法律实体或自然人，若对一方当事人具有控制性影响，或者与仲裁裁决有直接经济利益，或者负有根据仲裁裁决补偿一方当事人的责任，可视同于该方当事人。”⁶另外，2024 版利冲指引新增规定了一方当事人拥有控制性影响的法律实体或自然人是否也应当视为当事人的问题。根据第（6）条第（c）款：“一方当事人拥有控制性影响的法律实体或自然人，可以被视为具有该方当事人的身份。”

针对国际仲裁中日趋流行的第三方资助实践，新版利冲指引在第（6）条的解释中进一步明确，在衡量仲裁员独立性时应考虑第三方资助者是否存在“可能对争议案件的起诉或辩护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对仲裁一方当事人有控制性影响，或对仲裁程序的进行（包括仲裁员的选择）有影响”⁷来判断资助者是否应视同于被资助方当事人。

新版利冲指引在第（6）条的解释中还将相关当事人分为公司和国家，通过举例的方式对控制性影响（controlling influence）进行了阐述。对于公司当事人而言，若仲裁当事人为母公司，其拥有控制性影响的子公司可能被视为具有母公司的身份；若仲裁当事人为自然人时，其“紧密持有”（closely held）的公司亦可能会被视为具有该自然人的身份。⁸对国家主体、国家机构等作为仲裁当事人的情形，新版利冲指引并不提倡在不考虑具体国情条件下简单认定中央与地方权力机构存在控制性影响，但仍要求仲裁员考虑披露与任何该国家当事人的地方当局、或自治机构等独立的法律实体可能存在的关系，即使该等法律实体与国家的关系不一定符合“控制性影响”或“对争议裁决有直接经济利益”的考察标准。⁹

D. 仲裁员与当事人的义务

2024 版利冲指引在一般标准 7 “仲裁员与当事人的义务”扩充了当事人的告知义务，即当事人除应向仲裁员、仲裁庭、其他当事人、仲裁机构或其他仲裁员指定机构（如有）披露该当事人（或其所属集团的另一公司或对该当事人拥有控制性影响的个人或实体）与仲裁员之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还应披露（1）任何该当事人拥有控制性影响的个人或实体与仲裁员之间的关系，（2）仲裁员与跟仲裁裁决有直接经济利益或负有根据仲裁裁决补偿一方当事人义务的任何个人或实体直接的关系，以及（3）该当事人认为仲裁员在依据一般标准 3 进行信息披露时应予考虑的任何个人或实体。需要指出，新版利冲指引在第（7）条的解释中明确提出

当事人应披露向其提供案件咨询意见但未担任仲裁代理人的律师身份。

2. 第二部分“一般标准的实际适用”的修订

与前两版利冲指引相似，新版利冲指引第二部分“一般规则的实际适用”仍以清单形式非穷尽地列举了特定情形下是否构成仲裁员不适格或者具有披露义务。清单分为红色、橙色和绿色3类，分别对应不同情形下的潜在利益冲突披露和回避义务（如下表）：

清单类型		含义	仲裁员是否有披露义务	仲裁员是否应当回避
红色清单	不可弃权红色清单	利益冲突严重至无法担任仲裁员	是	是 ¹⁰
	可弃权红色清单	利益冲突严重程度稍弱	是	除非当事各方充分知情并明确同意，否则应当回避。 ¹¹
橙色清单		根据事实可能引起各方怀疑的情况 ¹²	是	当事人若未在披露后提出异议，则认为认可相关仲裁员。 ¹³
绿色清单		不会造成利益冲突的情况	否	否

A. “不可弃权红色清单”的修订

2024 版利冲指引对此部分，基本上仅对特定的人称代词（“她/他（的）”）¹⁴和对律师事务所的指代方式作了修改。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清单中多处提及的“关联主体”（affiliate），新版利冲指引提供了更宽泛的定义，即除了 2014 版利冲指引中提及的“包括公司集团中的所有公司，包括母公司”外，“关联主体”还包括对一方当事人拥有控制性影响的个人，和/或一方当事人拥有控制性影响的任何人或实体。”

B. “可弃权红色清单”的修订

2024 版利冲指引对此部分内容基本上仅做了结构性微调，即将 2014 版指引中分别列出的“仲裁员正在为一方当事人提供代理或咨询”（第 2.3.1 项）和“仲裁员经常为一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关联主体提供代理或咨询”（第 2.3.7 项）合并表述为：“仲裁员正在或经常为一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关联主体提供代理或咨询，但并未从该等代理或咨询中获取重大经济收入”。

C. “橙色清单”和“绿色清单”的修订

2024 版对橙色清单的修改较多，大幅修改或增添了数种应当披露的情形；绿色清单仅增

添了第 1 项。此处分为 5 个类简要介绍：

事项	所属清单	条文内容
专家证人	橙色清单	仲裁员目前或在过去 3 年内曾在无关联案件中担任一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关联主体的专家（第 3.1.6 项）。 仲裁员在过去 3 年中曾逾 3 次被同一律师或同一律师事务所指定为专家（第 3.2.9 项）。
	绿色清单	若仲裁员在担任另一仲裁案件的仲裁员时听取了在当前程序中出庭的专家的证词，则仅属于绿色清单项目（第 4.5.1 项）。
模拟庭审	橙色清单	仲裁员在过去 3 年中曾逾 3 次被同一律师或同一律师事务所指定协助模拟庭审或开庭准备工作（第 3.2.10 项）。
共同担任仲裁员	橙色清单	仲裁员和一方当事人的律师目前在另一仲裁案件中共同担任仲裁员（第 3.2.12 项）。
公开支持一方观点	橙色清单	仲裁员通过社交媒体或在线专业网络交流平台或其他方式，在公开发表的论文或演讲中公开主张对案件所持的立场（第 3.4.2 项）。
仲裁员在机构任职	橙色清单	仲裁员在争议（案件）的管理机构或（仲裁员）指定机构中担任行政职务或其他决策性职务，并在该职位上参与仲裁案件的决定（第 3.4.3 项）。

可以看出，新版利冲指引虽仅在 2014 版本基础上做了“小修小补”，但处处体现国际律师协会修订小组对过往十余年的国际商事仲裁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所出现的重点潜在利益冲突问题的审慎观察与应对努力。笔者相信，新版利冲指引在未来的国际仲裁实践中也会与其他国际律师协会相关仲裁指引一道，为仲裁用户提供更务实的“软法”指引。对于新版利冲指引对中国内地仲裁与司法审查实践的启示意义，笔者将在下期文章中进一步介绍，敬请期待。

-
- 1 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第（3）条第（e）款。
 - 2 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第（3）条第（g）款。
 - 3 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第（4）条第（a）款。
 - 4 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第（4）条第（a）款第 3 段。
 - 5 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第（6）条第（a）款。
 - 6 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第（6）条第（b）款。
 - 7 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第（6）条解释（b）。
 - 8 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第（6）条解释（c）。
 - 9 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第（6）条解释（c）。
 - 10 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第（2）条第（d）款，第（4）条第（b）款。
 - 11 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第（4）条第（c）款。
 - 12 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第（3）条第（a）款。
 - 13 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第（4）条第（c）款。
 - 14 《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24 版）中将所有“她/他（的）”的指代换成了不具性别特质的“仲裁员”。

本期部分作者



李露（成都）

+86 28 8324 7123
lilu@jtn.com



曾胜（北京）

+86 10 5706 8208
zengsheng@jtn.com



吕斯琼（上海）

+86 21 3886 2246
lvsiqiong@jtn.com



林慕娟（上海）

+86 21 3886 2367
linmujuan@jtn.com



易旸（大连）

+86 411 8442 6666-8005
yiyang@jtn.com



史强（大连）

+86 411 8442 6666-8057
shiqiang@jtn.com



李岚（深圳）

+86 755 2348 2627
lilan@jtn.com



刘丁敏（深圳）

+86 755 2223 5518
liudingmin@jtn.com



JT&N 金诚同达

www.jtn.com